



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50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2001 年 1 月 22 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大会主席的信

随函附上霍尔布鲁克大使 2001 年 1 月 17 日对非洲集团发表的讲话全文（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詹姆斯·B·坎宁安(签名)

## 2001年1月2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德·C·霍尔布鲁克大使2001年1月17日在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向非洲集团发表的讲话

大使，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给我这次好机会，向我的非洲集团朋友和如此众多的其他大使及今天到这里来的其他朋友——以及我想是奉命到场的我的工作人员“道别”。我想感谢你，大使先生和克波斯特拉大使作为非统组织主席的代表给我这次机会，而且我想同你们一起，感谢你们恰当称为“酋长”的人，我的酋长，阿瑟·姆巴内福，我的朋友，我的酋长，感谢他昨晚举行了令人愉快的招待会。除了阿瑟·姆巴内福，一位伟大的大使，一位挚友，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我想像不出会希望联合国任何其他大使举行这次招待会。非常感谢你。

这是我将发表讲话的唯一区域集团。的确像朱瓦耶伊大使所说的那样，一半是我们的建议，一半是非统组织的邀请。但我想对非洲讲话，因为一年半前我在确认听证会上保证，非洲将是我们的优先事项。而且我想在任务结束时向你们作某种汇报，说明我们做了哪些事，我认为我们学到的东西和几点想法。而且我保证，与我的名声相符，我将在随后几分钟里提出一些挑战性建议。

但我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友谊、你们的忠告和你们的鼓励。我们仍致力于我们未完成的议程，并且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将继续深入参与非洲事务和非洲问题。我们还剩下两天，我在联合国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将是安全理事会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维持和平的公开会议。我希望你们许多人将能同我们一起开会。我打算在这次会议上很坦率地讨论我认为联合国仍存在什么缺陷，以及联合国正在怎样消除艾滋病，尤其是在自己的维持和平部队里。

所以，把艾滋病留到后天的公开会议，请允许我谈一谈有关非洲的其它问题。让我首先谈三点很基本、相互关联的问题。

非洲事务。

联合国事务。

以及美国既支持联合国机构又支持非洲的立场在过去两年中大为加强。

特别关于非洲，我常常听到双重标准的指控。我知道这些指控来自哪里。我要讲清楚，至少对我来说，不存在双重标准。

我带着申明的三个重大优先事项来到纽约：改革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和改革整个机构、巴尔干及非洲。我们明天将在安全理事会上讨论巴尔干。关于会费分摊比额表，有必要实现重要改革从而捍卫联合国，确定了我们努力的参数。

但在非洲，我在能够采取行动之前需要学习。这个会议室里的人和其他人，特别是我们伟大的秘书长科菲·安南，是我最好的老师。你们向我介绍了你们国内的复杂情况，教我识别在美国鲜为人知的各别国家的特点。而且你们答应我，如果我作出持续的努力，你们会支持我。

当我宣布第一次重要出访将去非洲时，虽然先前有过两次短暂的出访，一次到东帝汶，一次到巴尔干，你们正确地到我这里说——当我最初宣布访问将是“学习和倾听访问”时——南共体大使到我这里说，这样做不够好。我不能只去学习和倾听，我必须去做一些事情。你们说得对，我当场同意改变出访的类型。我担心，如果我在对该地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行动之旅，你们——这个会议室里的大使——会说这是美国的傲慢。所以，我试图先去学习，但当你们让我一开始就扮演活动家时，我听了你们的话，做了你们让我干的事，即不仅仅去倾听，我在世界其它地区就是这样做的。你们在非洲大陆各地敞开了大门。我们，凯蒂和我，在第一次访问中去了十个国家。我十分感谢你们的款待。我向那些邀请我去，但还没有机会去的国家表示抱歉。你们使我面对你们每天处理的各种危机和挑战，你们最后表明了非洲人民对联合国和美国的信念和希望。

我们的第一站是马里，我们的第二站是安哥拉。反差不能再明显了。在马里，我受到了我的朋友莫克塔尔·乌瓦纳及其总统，科纳雷总统的迎接。我们看到了蓬勃发展的政治结构——尽管贫穷——和令人钦佩的进步。但在安哥拉，我所目睹的最困难的局势之一，从人民状况来说，也许是我到过的最糟糕的国家，我看到了你们都熟悉的情况——自 1961 年以来一直打内战的国家，尽管有过三个重大的和平进程，五个联合国行动以及数十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人民继续受苦，世界最高的婴儿死亡率，而这一切发生在每天向我国提供 7% 的石油，并得到数十亿美元外汇收入的国家。

正如安哥拉主教们在其牧函中所说的，在石油和钻石使争夺权力的冲突加剧的时候，受苦的是人民。超级大国把这个美丽的国家变成了冷战的战场。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政策拖延很久，但可喜地不再和萨文比玩游戏，局势有了转机，但仍然很可怕。安哥拉国内难民有 250 万，他们不在难民专员办事处权限范围之内，我亲眼看到其中一些人。正是这次安哥拉访问，而不是任何其它事情，驱使我们不停地奔走游说，使难民专员办事处承担对国内难民，所谓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责

任。我敦促这个会议室里的朋友们，不要放弃这个问题。我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新首长，吕贝尔斯首相谈了这个问题。他正在处理此事，秘书长安南正在处理此事。但我认为不光彩的是，其它官僚机构成员到我这里争论是谁的错误，谁的责任。他们应开会指定每个国家的国内难民的牵头机构。在多数情况下，该机构应是难民专员办事处，但如果不是，让其它单位干。别只坐在纽约和日内瓦争论这个问题，说三道四。

在安哥拉，我看到腐败无能的政府与应受谴责的叛乱运动难解难分地作战，双方都不把安哥拉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见到一位名叫拉斐尔·马克斯的年青记者，他因发表一篇抨击高层腐败的文章在监狱里呆了 38 天。我见到一位牧师，他曾遭到殖民特务机关的酷刑折磨，但仍将其有生之年献给了社会正义事业。我还见到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善良男女，他们想为正义和持久和平共同努力。

安哥拉体现了伟大的非洲大陆的严重问题和巨大潜力。我认为不应该忘记安哥拉。考虑到安哥拉问题的严重程度，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概述世界问题时，常常讨论五十个问题，却甚至不提安哥拉。安哥拉人民经受了同世界任何其它民族一样漫长的苦难，如果不是更漫长的话。

从那次访问，以及我访问的其它八个国家涌现出许多主题。集中对付艾滋病/艾滋病的主题、去年 1 月美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决定专门讨论非洲问题，以及许多其它事情。在宣布去年 1 月——新千年的第一个月为“非洲月”时，我们说我们认为去年应是联合国“非洲年”，就这样做了。我们在非洲花了时间。虽然我不能对你们扯慌，说我们解决了非洲问题——我一会儿再谈这点——我认为，可以说我们遵守了诺言，我们使非洲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历史性地扩大了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传统范围。副总统戈尔正好一年前主持安全理事会历史上第一次保健问题讨论时——不顾许多传统主义者，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我们提出了 1945 年的狭隘安全定义不再适用于现代世界的论点，并赢得了对该论点的支持。我坚信——而且我知道，我获得这里的非洲朋友的大力支持——联合国不能像一群孤岛那样运作，争夺管辖范围，争夺地盘。我们需要合作。你们的支持——联合国非洲成员——突尼斯、马里、纳米比亚和你们的朋友牙买加等说服了一些安全理事会较传统的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劝说它们应讨论保健问题。星期五的会议将是第三次保健问题会议。你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

我们认识到，非洲人想要一个作出回应、多学科和相关的安全理事会。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最忠诚和要求最高的会员。你们的忠诚是有道理的。你们的要求也是有道理的。我们——美国和你们非洲集团——在这个框架内有几项重大的共同

政策目标。第一，我们必须支持共同的目标使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获得成功。这意味着按照现实任务执行计划周全的行动。这意味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准备充分的特遣队。这意味着维和部行动更能对部队派遣国作出回应。我深感不安的是，行预咨委会否决了第三位主管维持和平助理秘书长。我对此感到不解，不仅因为所有国家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核可的卜拉希米报告要求设立这个职位，而且因为行预咨委会否决了将来自部队派遣国的主管维持和平助理秘书长。我不理解这种作法。一些部队派遣国，行预咨委会内的代表冒充独立专家——我向你们保证他们不是专家，投票反对符合部队派遣国利益的事情。我们有大家都尊重的阿纳比先生，我们有一个美国人迈克尔·希恩。我希望你们都结识希恩，他是一名杰出的美国官员，他将协助与国会的关系。但第三位助理秘书长将来自部队派遣国，不是五常的人，也不一定是安理会成员的人。我请求你们把这第三位助理秘书长要回来。你们需要这个职位。

联合国有一个象国防部的组织，其中只有两个助理。450名或500名人员，负责管理全世界的行动，这是不行的。你们必须把军队与警察、后勤与行动、计划与人事分开，而且你们需要几位助理来做这项工作。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目前在让-马里·盖埃诺领导下的维和部里有一位美国助理，但我们需要部队派遣国有一位助理秘书长级的真正代表。所以我希望，在我离开后，你们非洲集团的国家将在五月份讨论这个问题时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我们与你们共有的另一个目标是扩大联合国在非洲的维持和平活动。无论是对于刚果、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布隆迪、索马里、几内亚比绍、苏丹、西撒哈拉、安哥拉、中非共和国或索马里，我们都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联合国有必要在这些地方存在，因为那里没有其他力量；而且，联合国必须拥有解决问题所需的人力、资源和授权。我回头还将谈到刚果，因为那里在过去几个小时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们都知道过去在哪些地方出现了怎样的失误，我们不能再犯这些错误。然而，除非联合国配备有更好的人力资源，建立清晰的通信系统，开展最佳的宣传交流并承担共同任务，不然，这些失误还会重现。在塞拉利昂的每个国家都对授权任务有不同理解。几内亚人、赞比亚人、尼日利亚人、印度人和其他国籍者都对其任务有不同理解。联系交流中断。只有三个人在纽约监管在塞拉利昂的业务活动。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必须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没有什麼比这更加重要，而它对非洲最为重要。如今，维持和平经费分摊比额表在其历史上首次作了调整，而且我们相信美国于1994年自行对自己规定的25%维持和平经费这一上限将会取消——我对未出席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的人们强调这一点，现在是更多支持维持和平行动的时候了。

此时此刻，鲍威尔将军的任命听证正在进行之中。他将被问及这一问题。赫尔姆斯参议员及其同事已表示，如果新政府支持取消 25% 的上限，他们将有所回应。你们慷慨降低了我们的分摊额，因此，参议员拜登将就此提出提案，我希望、我相信我们会采取行动缴付欠款，而且我将力争。如果情况一如所料，我恳请你们利用这一机遇。对联合国而言以及在联合国内部，没有什麼比这更为重要。这对非洲的影响最大。

我们的第三个共同目标是使联合国成为一个重要系统，更积极因应其成员的需求。我所说的成员并非指稳坐在这栋大楼里或在日内瓦的公务员，而是指联合国所花费的来自每个纳税人的每一块美元、奈拉或英镑的应有受益者。必须加强和扩大维持和平行动部以体现这样一个现实，即该部是世界上最忙的国防部之一。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无论从哪个实际角度讲，副秘书长让一马里·盖埃诺是联合国这一重要机构的国防部长或维持和平部长。我们必须协助他取得更大成功。我再次恳请你们不要让三流官僚、让那些甚至不遵守在座一些大使的指示的人深夜闭门开会，搅乱如卜拉希米报告这样重要的事务。这位副秘书长必须拥有执行任务的手段，这对非洲比对世界任何地方都更为重要，尽管这对东帝汶、黎巴嫩、科索沃、波斯尼亚、塞浦路斯和其他地方也有关系。

我们的第四个共同目标是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这意味着更多资源和更加坦诚。我们必须将此问题置于最优先地位，这就是为什麼我们要在星期五努力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的第五个共同目标是发展。我不想忽略发展问题，而且我尤其要对我的加勒比朋友及来自维持和平业务地区外的朋友强调，美国并没有以维持和平取代发展，而是同时增加了用于这两个问题的资金。联合国的创立主要是为了防止世界冲突复燃。从狭义上讲，联合国取得了成功，因为我们已有 55 年未发生世界大战，但小规模战争的次数非常之多，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集中精力关注日益增加的发展重担，这一重担是联合国创始者无法预料或想象的。

对联合国创始者完全未曾预料、并且是各国一系列错误所致的另外一个问题，联合国还没有用以处理的手段。这是新出现的安全挑战之一，这可能是非洲、巴尔干和亚洲部分地区在 21 世纪爆发新的安全挑战。

至于具体问题，我想简单谈谈塞拉利昂和刚果。我遗憾地指出，我们在送旧迎新之际未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来自塞拉利昂的一个好消息是，经过去年春季的一场真正危机后，塞拉利昂目前的局势已经稳定，但这一局势并非可以接受的均势。这是一个均势，但不稳定，而且我可以肯定，它若不是严重恶化，便是趋于好转。只有在联合国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以打破僵局的情况下局势才会好转。如果我们放任不管，局势迟早要爆炸。

现在，我扼要谈谈此时正笼罩着金沙萨的这场危机。今天上午我们走进这个会议室时还不清楚金沙萨发生了什麼情况。我们得到的报告都互相矛盾，我也无须告诉你们最新的报告，因为除了你们已了解的公开信息外，我一无所知。但我想就刚果局势谈谈一般性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我在政府内外工作 38 年所碰到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刚果问题那么复杂艰难。刚果问题所涉的各种角色都有，比任何其他问题都多，简直是难以应对。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据报卡比拉总统已经死亡，可能改变政治局面，事实上这必然会改变政治局面，但它不会改变这样一个根本现实，那就是无论卡比拉总统是否生存——有关这一问题的报道互相矛盾，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刚果必须经历和平的民主过渡。我们大家必须与刚果人民一起积极努力，未雨绸缪，以期改变局势，使人民广泛参与的政府取代专横统治和分裂。

在我担任这一工作前便已签署的《卢萨卡停火协定》始终是这一过渡进程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出发点，是理性和明智的计划，我对奇卢巴总统在此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但我们应坦率直言。每一签署方无一例外地都违反了该协定。如果需要修订协定才能得以执行，那就修订好了。但每当我们提出对协定作最细微的修改时，每个人都说“不行，不能修改协定的任何部分，动一发则牵动全局”，所以我们只得死守卢萨卡计划，而它仍未得以执行。我们面临怎样的局面呢？这一局面迫使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在其权力范围内决定不全面部署已核准的 5 537 名部队官兵。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决定，不过，许多非洲人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这也可以理解。但是，除非卢萨卡协定各签署方执行撤军和复员计划，除非卡比拉总统及其政府开展全民对话，不然，秘书长怎么能将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派到一个局势不稳、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呢？联合国过去 40 年来丧生的维持和平人员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因此，要么执行《卢萨卡协定》，要么加以修订。无论金沙萨局势如何，必须恢复全民对话。重要的是，占领刚果大片地区的外国部队必须停止攻击行动。他们不应利用发生在金沙萨的事件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不应在金沙萨的内政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确保那些拿起武器的刚果人与其选择非武力反抗的同胞一样在会议桌都有一席之地。

现在，我要谈谈西非危机，因为这一问题也值得一提。首先要提的是，几内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塞拉利昂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利比里亚则如你们大家所知，自美国立国时起便与美国有特殊关系。如今，这三个国家的情况都很糟，而上个世纪的所谓大国对其在这三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应感到骄傲。尽管如此，在审视了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后，我们仍必须处理这些不断发展的现实问题。我不妨补充一句，刚果问题也同样如此。除非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政府能实现民治、民享，不然，武装起义在所难免。在西非危机问题上值得一提的第三点是不对邻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一非洲传统的崩溃。我记得已故伟大的尼雷尔总统在

决定是否应推翻乌干达伊迪·阿明的残暴统治时苦思不定，他对非统组织原则的坚定信念与对阿明政府的极端行为所产生的道德义愤互相冲突。最后，他还是出于道义而进行干涉，但实在是勉强而为。但是在今天，我们环顾世界，环顾非洲，便会看到有些非洲领导人总是出于错误、自私、为自己和朋友谋私利或财富等种种理由而无所顾忌地进行干涉，对腐败、可憎的领导人却不加制止。

第四，国际社会必须为冲突各方提供接受谈判解决的机会，但是，如果一方显然缺乏诚意，我们就必须要求联合国放弃中立立场。波斯尼亚发生的情况便是如此。联合国在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侵略者及其受害者之间保持中立的时间太长。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完全失败，以致美国为求恢复波斯尼亚和平而不得不将联合国撇在一边，率领北约进行干预。我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尽管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遗憾。是我告诉联合国不能派代表参加代顿谈判，我并不喜欢做这件事，因为我爱戴并尊重联合国这一组织。但联合国未把握住机会。我们应坦率地面对塞拉利昂等地的局势。我们应坦率地表明，如果一方是主要肇事者，则我们要让联合国表明它的感受。

在此方面，我非常高兴的是，去年通过的关于钻石和其他问题的新近几份决议对我们认为应对局势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施加了压力。塞拉利昂已有一个脆弱的政府，但却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它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设法处理联阵的问题，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反感的叛军之一。它得到了曾是国际社会引以自豪和守法之一员、非统组织创始者之一的支持。我们感到痛惜的是，该国现政府抛弃了这些理想。我们感到痛惜，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对那些已成为问题之主要根源的领导人施加更多压力，诸如南斯拉夫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那样的主要肇事者。

现在，我想撇下刚果、安哥拉、塞拉利昂危机，谈谈非洲在过去 18 个月的一般情况。

最近，加纳总统罗林斯在观摩一次激励全世界的精彩的民主选举时提醒我们，非洲需要听到更多的自愿放弃权力的领导人的讲话。非洲许多总统都有过类似表示，如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总统和迪乌夫总统，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和姆维尼总统，博茨瓦纳总统马西雷，当然，还有尊敬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但这样的讲话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并不普遍。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会再将加纳备受赞誉的那种和平、民主的过渡视为例外情况。

让我谈谈一个难题：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好好地为非洲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最难解答的问题，因为不管在座各位是否同意我所说的，但是，各位都深爱贵国和非洲大陆。可是，我们必须老实地承认，我们可以为非洲人民做得更好。



我们在联合国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非洲的问题由非洲人解决”。我自己在谈到卢萨卡协定等问题时就经常引用这句话。但是，不管非洲抱着什么意愿和作何解释，有时西方把这句话——非洲的问题由非洲人解决——用作不采取行动的借口。他们的解释是：“这是非洲的问题，因此，让非洲人来解决。”我坚决反对。我们外部世界负有与非洲领导人致力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义务和决心。对我来说，“非洲的问题由非洲人解决”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再不会象 1884 年柏林会议一样，任由外国人按照其目的来瓜分非洲。但是，如果泛非主义的理想以非洲孤立主义为基础，这种理想永远不会实现。

我认为“非洲的问题由非洲人解决”应该指非洲人在国际社会协助下领导解决非洲大陆的问题。我们有许多实例：塞内加尔韦德总统、马里科纳雷总统、赞比亚奇卢巴总统、莫桑比克希萨诺总统、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总统、吉布提贾勒赫总统、南非姆贝基总统、加蓬邦戈总统和尼日利亚奥巴桑乔总统。我要告诉你，我认识其中一些领导人——认识大多数，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认识科纳雷总统、奥巴桑乔总统、姆贝基总统、马西雷总统、希萨诺总统和许多伟大的领导人，他们是世界级的政治家，领导非洲，并且是其他国家的楷模，认识他们是我一生莫大的光荣。

但是，“非洲的问题由非洲人解决”并非指“给我们钱，但不要你的意见。”它应当指非洲加入世界系统时抱着合作和互相依靠的态度。我不相信非洲与人不同。我来这里之前，人们告诉我，特别是非洲专家告诉我，非洲是独特的，与人不同。幸运的是，我曾在亚洲和欧洲工作，在我去非洲之前，人们告诉我，亚洲是不同的、独特的，欧洲是不同的、独特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各种问题都不是独有的。去年 5 月安全理事会之旅后，我把这件事告诉非洲朋友，他们都感到惊诧。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们在刚果、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非洲其他部分面对的一切问题都是类似的，有些在结构上与我们在亚洲和欧洲面对的相同，这并非不敬。这标志着存在具有个别和地方特式的普遍问题，因此，必须经这种方式来解决。

如果非统组织和西非经共体、南共体等其他组织——我同这两个组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要与非洲联盟、东盟、美洲国家组织、北美贸协和其他区域集团并驾齐驱的话，就必须老实地清除非洲演变过程中的路障。我相信这是可能的，我相信这应当是非洲的目标。

让我坦诚地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非洲的领导人机构和机构没有恰当地为伟大的非洲人民服务。非统组织是一个伟大的机构，具有光荣的和绚烂的历史。我非常敬重你们的秘书长萨利姆·萨利姆，他是我的朋友。但是，非洲统一组织作为一个组织，近年来有时候尾大不掉。如果议程上开列的是解放问题，非统组

织是统一的，并且作出极端重要和具有历史性的贡献。所有非殖民化的设计师都认同非统组织，例如尼雷尔、纳赛尔、恩克鲁马、杜尔、本-贝拉和卡马等。但是，我们现在已到了新世纪的第二年，如果非洲组织的驱动力仍然停留在解放的意识形态上，则这个机构必将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的博物馆。

现在非统组织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决定不准以不符宪法规定的手段夺取权力的政府取得席位。这一决定已经对科特迪瓦和科摩罗的局势产生积极影响。非统组织能不能把这项决定扩大，包括以不符宪法的手段维持权力的政府、或破坏国际上就钻石问题执行制裁的政府，或引至其邻邦发生内战的政府在内？如果对某些政府在其国内为所欲为不愿提出挑战，非统组织不妨考虑一马当先，提倡经济和政治融合。

当非洲团结一致高举这些理想——你们在所有宣言中雄辩地宣扬的理想，这种团结就成为促进区域议程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非洲一致决定不批评某一非洲国家，或是自动地设想它的议程与不结盟运动或 77 国集团的议程毫无分别，则团结可以构成障碍。我认为当非洲集团在世界舞台成为一股主要力量时——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一股主要力量——重新界定如何利用团结作为提倡和保卫共同民主价值的工具是一项重大挑战。

现在我知道，如果我离开前不留下挑战性的意见，你会十分失望，因此，我要讲出来。我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已有 18 个月，我得到一种结论，今天我要与你们分享。我知道会有争议。我估计你不会同意，即使你同意，我估计你在这个时候不能随便公开地说出来。但是，我希望你会展开辩论，来年加以思考。我是向互相尊重的朋友提出这个问题的。我看到这里有许多、许多朋友。

今天我严肃地提请非洲国家重新考虑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现在不结盟运动不是非洲的朋友。你们的目标与不结盟运动不同。现在担任不结盟运动主席的是南非大使，我的好朋友杜米萨尼·库马洛，他灵活而干练地处理这个问题。杜米萨尼干练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不结盟运动都没有按照非洲的立场办事，而是按照其他外来问题办事。通过不结盟运动团结一致的方式，使非洲支持不符合非洲利益的立场。这是空前不正常的。

不结盟运动和非统组织有些创立人是相同的。你们都很熟识它的根源。它是在 1955 年在万隆产生的，那里正值冷战高峰众说纷芸的不同世代，出席者有周恩来、铁托、苏加诺、恩克鲁马和纳赛尔。但是，现在是 2001 年，我没有看到在那一个问题上不结盟运动的立场是真正对非洲集团有利的。你们同非洲以外激进分子和一、二个非洲成员——它们不代表非洲人民的利益，一直抱着其他问题——垄断的集团结合，使非统组织——非洲集团——的声音减弱。77 国集团稍有不同，因为 77 国集团全力注意经济问题。我同 77 国集团存在一些难题，因

为 77 国集团有些成员根本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77 国集团领头提出的摊分比例表常常是很奇特的，这是由于 77 国集团的立场是它的最富有成员提出的，不符合贫穷成员的利益。但是，我了解 77 国集团的价值观点，因为资源转让是合理的重要问题，你们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努力不懈。

但是，我认为不结盟运动应当停止作为一个核心小组，或与 77 国集团结合，不然，你们和非洲集团——我认识到这个问题要由比这里层次高得多的人来决定——应当考虑与不结盟运动疏远。这样你才能保卫非洲的利益，不会让不足 10 个激进国家把你们拉到你们不需要采取的立场上。现在这里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两个集团的成员，我知道我提出的建议具有深意和历史意义。我要在三天内离开，因此，我要给你提出可供辩论的问题。

所有同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我在过去 17 个月任内一再提出各种立场，人们最初会认为是讨厌的或具有挑战性，但是，我们月复一月地讨论，并加以思考后，就取得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如果我会在这里再逗留一年，我会以较平静的方式提出同样建议。然后就同你们每一位商谈，直至我们发现是否可行时为止，但是，由于我不能这样做，我仅想要你们去想一想。鉴于你所负的责任——我仅向非洲朋友们说，不是对这里非洲以外的大使们说的，尽管我看到这里有很多亲切的非洲以外的大使们——你应当思考其他组织，尤其是不结盟运动如何削弱你们的核心议程。这是你们的机构。非洲在联合国是一支压倒性力量，如果你希望如此的话。因此，为非洲想想，不要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其他问题上追随别人，这些问题应由其他人去奋斗，这是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冷战的斗争遗留下来的，或是几个过时的国家一些残存的激进主义所遗下的。

不过，我说了一箩筐的话，我要向库马洛大使致敬。由于他负责领导不结盟运动，使我们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如果换了别人，情况可能更困难。

让我就此结束。我相信非洲的安全、福祉和自由最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就象对非洲一样。创立联合国的人物是高瞻远瞩的，他们越出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基础的传统思想。他们知道安全和繁荣是全球性的，不能独立存在。派驻纽约的非洲各国代表深知，除了非洲四个最大的国家常会得到人们倾听外，个别提出的声音很难受人注意，对较小的国家来说，集体提出是很重要的，越多人一起集体提出来就越有效。我在纽约任内，你们让我荣幸地单独和集体地向你们发言，并且日渐把我作为朋友看待。在这两种情况下，你们发出的信息是对联合国具有信心，对美国的作用寄以希望，并且代表非洲人民表示已到了刻不容缓阶段。

以个人名义说，我要向你保证，我得到你们的信息，当我恢复平民生活后将会继续聆听下去。我打算继续积极地接触非洲问题，并希望同愿意维持对话的任

何人继续对话。我希望再次前往非洲，同时在凯蒂和我同各位大使代表的非洲集团以及同美国许多关心非洲的人士结交的牢固友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希望你继续把我看成是以非洲为优先目标而战斗的全球人士的一部分——这就是在我离职时只向非洲集团说话，不向其他区域集团说话的原因——是了解非洲的重要性、关心非洲大陆、非洲的问题、特别是非洲人民的日益增多的美国人之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继续把我看作朋友。

谢谢

---